

中国基督宗教如何面向新世纪

陈建明

〔摘要〕 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其在新世纪中应有的作为和走向为：爱国守法，荣神益人；进一步实行本土化；参与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参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神学体系；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贡献。

〔关键词〕 中国；基督宗教；天主教；新教；新世纪

〔中图分类号〕 B9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01) 04-0064-06

基督宗教^①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曾与中国社会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冲突，但经过不断地调整传教方式，努力适应中国社会，已基本上成为一种中国化的宗教，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今后的走向理当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

基督宗教同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具有“入乡随俗”、“与时俱变”的特性。使徒保罗提倡“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1〕}。基督宗教在其发展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就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四个阶段。早期基督宗教由反对罗马奴隶制帝国到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中世纪的基督宗教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而发展到自己的顶峰，宗教改革又使基督教进一步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说明基督宗教不仅能够适应某一特定的社会，而且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为了适应社会和历史发展，基督宗教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本土化，或曰本色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签署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指出：“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教会早就学会了用不同民族的概念和语言表达基督教的信息，尝试着按照他们的哲学家的智慧纯清基督教的信息，这是一种使

福音适应全人类的理智的尝试，是有知识的人的需要。确实，这种适应和传道是一切传教活动的法则。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在每个国家用适当的术语表达基督的信息，才能使教会与不同的文化有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这说明天主教已经认识到与各民族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重要性。新教的许多神学流派与宗派所关心的重点也从未来的天国转向现实世界，注意与当代社会相适应。西方许多新教教会着眼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建立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学校，兴办慈善事业，关注社会道德，提供社会服务，有的教会更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影响本国的内外政策，直至参加总统的竞选。

基督宗教在中国同样经历了与社会相适应的本土化历程。从唐太宗贞观年间景教传入算起，基督宗教出现在中国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从明代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开始活动算起，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作为基督宗教持续性、大规模传教开端的话，距今则只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不论基督宗教在中国活动的历史长短，其在变化、适应中发展则是一贯的。

基督宗教作为具有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宗教，蕴含着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与中国固有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明末清初至近代，中外传教

①本文提到的基督宗教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个派别；易混淆时，特注明天主教或新教。

〔作者简介〕陈建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士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设法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为了调整与中国政权的关系，向封建帝王称臣纳贡，参与修改历法，寻求王权的保护；广泛结交中国士绅，与儒家文化相妥协，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祀祖，搞所谓“合儒辟佛”。近代来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差会极力兴办新式学校、报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如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麻风病院，参与赈灾活动；开展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和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以增强中国人在教会中的作用，弱化外国势力的影响；一部分中外传教士还积极支持中国社会的改良和民族民主革命。以上活动收到了一定效果，到1949年，基督宗教已经被一小部分中国人所接受，基督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改造和发展，中国基督宗教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是我国政府和人民认可的主要宗教。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办教会的方向，坚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获得了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教会组织不再受境外教会组织的控制，不再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利用的工具，而成为中国人民独立自办的宗教团体，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广大基督宗教信徒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作为中国社会的公民，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我国基督宗教界把爱国和爱教统一起来。他们不仅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带领广大信徒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在国际友好往来活动中起了有益的作用。“教会合一”是世界基督宗教界努力的目标，中国基督新教已在这方面走到了前面，各宗派求大同、存小异，实行了联合礼拜，进入后宗派时期。

据中国政府统计，截至1997年10月，中国天主教徒约四百万人，有教职人员约四千人，教堂、会所四千六百余座。全国性组织有两个：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办有会刊《中国天主教》。中国基督新教教徒约一千万人，有教牧传道人员一万八千余人，教堂一

万两千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二万五千余处。全国性组织两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办有会刊《天风》^[2]。这些成效的取得，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行了正确的宗教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教会积极开展“三自”运动的结果。正如徐如雷先生所说：“由于三自运动的开展，中国基督教成了真正中国的基督教，也就是说，由100多个外国差会在华传教区的基督教变成由中国信徒自办的基督教，并且进入了‘后宗派时期’的基督教，这是三自运动的巨大成就，这也是基督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3]

（二）

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宗教各项事业取得的进步世人有目共睹。但是，应当看到中国基督宗教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中国基督宗教界已经积累了许多独立自主办教会的经验，但上升为神学理论的还不多，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体系，神学思想明显滞后，这使得一些保守、落后甚至错误的宗教观念束缚了信教群众的思想，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丁光训主教曾严肃指出，不重视神学建设的宗教是低级的宗教。

多年来，教会缺乏高素质、高文化修养的神职人员，经过正规训练的教牧人员青黄不接，骨干队伍老化严重，而新信徒发展却比较快，导致信徒宗教信仰的整体水平不高。一些地方基督教育盲目地大发展，带来了教徒素质的低层次化，出现宗教活动的无序状态，如某些地方教牧同工互相嫉妒、争名夺利。人才缺乏和素质不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在教会内部，一些人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学习不够，法制观念淡薄；一些新入教的青年教徒对“三自”运动认识模糊，认为“三自”已经过时了，有的甚至否定“三自”，背离了爱国爱教的原则；还有一些教徒不到教堂过宗教生活，开辟地下聚会点。

一些教会内部管理混乱，甚至出现了腐败现象，如有的教会负责人任人为亲，把亲戚安插在教会的重要岗位；一些教会出现了贪污腐败的丑恶现象；有的地方无章可循、有章不循。^[4]

一些自封传道人没有传教资格，却进行跨地区传教布道（如2000年4月，一群来自河

南、河北和湖南等省的教徒到江西省永新县建立传教据点，进行非法传教活动，遭到取缔^[5]；甚至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的领导，宣扬极端主义观点，传播异端邪说，煽动宗教狂热，惑众敛财，残害群众（如1995年5月，在全国60多个城市同时出现打着教会旗号的反动传单，渲染末日灾难，攻击党和政府）^[6]；一些非法组织或个人常常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进行违法活动，由于没有受到教内有效的抵制而损害了基督教的形象。

一些西方基督教会组织更图谋卷土重来，控制中国基督教会，策动恢复基督教会内部的宗派活动，妄图分裂中国教会。罗马教廷利用天主教的普世性和教徒、神职人员对教皇的敬仰和遵从，不断派遣人员来华或用其他方法，秘密委任主教，策动和扶植地下势力，妄图分裂我国天主教。使得一部分神职人员和教徒对独立自主办教会的方针发生动摇，思想比较混乱。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阻碍了中梵关系的改善。

在一些地方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教会没有很好地组织经营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自养存在困难，导致宗教活动不能正常开展。

中国基督宗教内部也觉察到了存在的问题。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刘元仁主教指出目前天主教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我国天主教会还未形成成熟的、适应时代的、符合国情和教情的神学系统；二是我国现有400余万教友和5000余座教堂，神职人员严重不足，……而且神职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三是目前还有一些游离的神职人员和教友”^[7]。多年来，教会领袖和神学院的教师纷纷发表讲话和论文，指出存在的问题，讨论基督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相适应。

上述情况的存在，势必造成一些紧张局面，影响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基督宗教自身的正常发展。为了重视和克服存在的缺点，取得更大的进步，中国基督宗教界应认真学习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国情，掌握当前的宗教政策。以下几点是必须引起注意的：

1. 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中国当前的各项事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和共同愿望。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也为了自身的发展，中国基督宗教应同其他宗教一样，做到“四个维护”，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2. 过去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宗教活动不能正常开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出现巨大变化和进步，中国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的活动日趋正常，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教会与政权应当分离，但宗教与政治是无法分离的。教牧人员和广大信徒作为中国公民，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拥有爱国爱教的思想感情，才能与当前社会相适应。

3. 中国各宗教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中国政府、中国的宗教团体不会干预外国的宗教事务，同时也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和干预中国的宗教事务。中国基督宗教第四次在华传播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以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才得以展开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宗教才彻底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由于当前国际上存在妄图干扰中国独立自主办教会的势力，中国基督宗教界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4. 在今天的中国，宗教活动被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应牢牢记住：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是，公民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不得妨碍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

中国基督宗教应当如何适应急剧变革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面向新世纪呢？答案是：中国基督宗教必须认真考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进一步重视宗教与当前社会相适应，同时关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1. 爱国守法，荣神益人。

中国基督徒具有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周恩来在关于基督教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8]历史事实说明，在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进程中，广大教徒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

在新的世纪里，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局势。宗教问题事关国家大局，宗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基督宗教应当考虑如何更好地爱国爱教，处理好政教关系，拥护、支持政府的各项工作；教会团体要适度发展，规范活动，提高教徒的素质；协助政府制止打着教会旗号的非法组织或活动；基督徒应当继续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与其他宗教徒和非宗教徒和睦相处，维护民族团结；在国际交往中，多做增强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事情，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不参与、不支持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如天主教需处理好政治上服从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宗教信仰上听从教皇的矛盾、教权与政权的关系等。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教会组织还应当加强对信徒的培训和教育。只有这样，基督宗教才能与社会和睦相处，受到尊重，才能有益于社会，服务人群。

2. 进一步实行本土化。

任何事物都是在适应和变化中寻求发展机会的。基督宗教只有实行本土化才是真正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斯（Hans Kung）指出：“如果基督徒坚定地相信福音信息应当走向全世界而不应局限于某些民族、某种生活方式、某种习惯的祭仪，那么结果必然是基督教的本土化。这不是对基督教的‘基要’和传统的背叛，而是进入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的联姻，由此丰富双方的内涵。如果基督教想要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推进力量，除了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舍此别无它途。”^[9]这段话用在中国基督宗教上是完全合适的。

在近代历史上，中外传教士曾经探讨和实践过中国教会自立和基督教本色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宗教已经奉行了数十年“三自”方针，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会，其本土化的轮廓已基本形成了，只是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中国基督宗教不断地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其结果必然是彻底实现本土化。当然，在本土化过程中，基督教会不可能保持绝对的传统意义的纯洁性，必然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做出一些适应性的改变和调整，但它始终将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通过外来宗教本土化的模式，“不再需要传教士从国外输入基督教，也不再需要单纯地把西方神学

译成中国概念。它追求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在一个独立（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框架里实现反映基督教的信念”^[10]。当然，中国基督宗教的本土化，除了进一步完善自立、自养、自传外，还要探讨教义、制度、仪式、建筑、绘画、音乐、语言等方面的问题。

3. 参与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

与本土化紧密联系的是不同文化的融合问题。中华民族文化是在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历代王朝对各类宗教文化大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基督教是人类著名文化体系之一，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华理当被中华文化所吸纳。中国基督宗教界人士和研究者应当考虑基督教如何更好地与中国现代文化相融合，还可以探索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卓新平先生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可包括五个层面：①基督教的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的自我审视具有反省意义。②基督教的拯救观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具有创价意义。③基督教的超越观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革具有启迪意义。④基督教的终极观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具有借鉴意义。⑤基督教的普世观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具有定位意义。“这些意义一旦被大多数中国人所发现或领悟，基督宗教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则会出现质的飞跃和重大改进。”^[11]果如此，基督教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亦将得到较大的提升。同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基督宗教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要加强对话、互补和融通。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基督教作为已经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系统，肯定是可以丰富及发扬中华文化上、在中华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上有所贡献的”^[12]。从近期来看，在人类终极关怀、培养爱心和献身精神、文学艺术修养、文化教育事业、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中国基督宗教都是大有可为的。

4. 参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基督新教，特别是初期清教禁欲主义崇尚艰苦劳动、节俭勤奋精神，注重时间效率，导致西方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财富急剧增长。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基督徒可以借鉴这种精神，为建设祖国出力。五十年来，广大基督徒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涌现出一批爱国爱教的先进人物。在新世纪里，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广大基督徒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应当继续积极地投身于这一事业。同时，中国基督宗教为了更好地独立自主办教会，就必须在经济上增强“自养”能力，如兴办一些工、商、服务等实体，开展文教事业和科技创新活动。

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是教会发挥作用的最佳途径，也是加强自养能力的一条出路。在历史上，中国教会就以办社会慈善事业而出名，如兴办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麻风病院，参与赈灾活动等。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机遇和竞争并存，人们分别面临着就学、就业、下岗、转岗、医疗、养老等压力，一些贫穷地区的人们甚至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中国各地教会发扬爱主爱人的精神，顺应社会需求，建立了老人院、医疗诊所等社会服务事业，其服务水平和奉献精神有口皆碑，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今后，中国基督教会在扶贫救灾、捐资助学、修桥补路、环境绿化、文物保护，以及支持当地重要的经济开发方面，仍可以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贡献一份力量。胡乔木曾提出：“宗教界可以做的公益事业很多”，以宗教名义办社会公益事业，“我们同宗教界的关系就加入新的内容，也给了宗教界一条积极的出路”。^[13]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基督宗教的道德观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宗教道德本身就是世俗社会道德宗教化的结果，因而可以作为世俗道德的补充。1988年春节前夕，李瑞环曾向宗教团体领导人表示：宗教教义中的许多内容，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要求，与现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宗教界对这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群的内容，要加以挖掘，加以整理，加以强调。^[14]在基督宗教教义中，诸如不偷盗、不奸淫、不贪财、不抢劫、不诬陷、不妄语、平等爱人等道德观念，除了规范教徒的行为外，也有益于世俗社会的安定团结，人间的和睦友善，能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发挥积极的作用。受教义的影响，中国基督徒绝大多数勤俭朴素、工作勤奋、待人诚恳、团结互助，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5.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神学体系。

中国基督宗教必须构建起自己的神学体系，才能解决好中国教徒的信仰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三自”爱国运动的成果。在旧中国，中

国教会人士曾不断地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诠释基督教的信仰，如吴雷川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固有语汇表达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新中国建立五十年来，中国教会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神学探讨，如从神学上、圣经的根据上认识三自运动的合理性，以道成肉身的神学理论鼓励基督徒关注现世的社会生活，今生与来世并重。吴耀宗先生在1951年指出：“若要真的‘自传’，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这样，我们才能把耶稣福音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15]。八九十年代以来，丁光训主教主张中国教会应该建设自己的神学，它不是模仿，而是中国基督徒针对中国教会自己的问题的思考。他对上帝论、基督论、人性、创造和救赎等问题做了神学解释；提出“上帝是爱”和“宇宙的基督”的思想，认为：“（一）基督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二）基督普及到整个宇宙的主宰以及以爱为其本质。”^[16]中国天主教提出要创造适应中国国情与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天主教神学，刘元仁主教说：“我们有天赋的职责去研究、挖掘和探索基督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交合点，寻求出适应中国文化、国情和教情的神学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福传方法。”^[17]虽然，中国教会的系统神学体系尚未形成，但教会人士已经在探索，并提出了有益的设想。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两会”正式作出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

在新的世纪里，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基督徒的金钱观、婚姻观、教会观；怎样正确对待政教关系、神人关系、神迹奇事、耶稣再来等问题，都应引起中国神学的考虑和解释。中国的神学家和基督徒应当通过分析比较世界上已有的各种神学，继续努力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和体系。通过神学思想的建设，将解决好中国教会内部不适合时代发展的落后观念，保证三自爱国运动的顺利开展。完成这一重任，不但需要老一辈宗教活动家指引方向，更需要有才华的中青年教职人员热情投入，刻苦钻研。

6. 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贡献。

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人类却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战争硝烟连绵不断，社会道德出现危机；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暴力和罪恶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着

……全世界宗教界对此深表关切。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有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这次大会发表的《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谴责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滥用；谴责贫穷、饥饿、贫富悬殊；谴责社会不公、忽视正义、混乱无序；谴责暴力、侵略和仇恨。宣布“我们珍视生物共同体，珍视人、动物和植物，珍视对地球、空气、水和土壤的保护”。“我们决心致力于一种非暴力、主敬、正义与和平的文化。我们要放弃以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绝不压迫、伤害、折磨或杀害其他人”。^[18]中国基督宗教界历来重视此次大会精神。丁光训主教指出：“只有建设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制度，实行财富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繁荣、和平、欢乐与进步，才能使人看到，我们基督教相信神是全能的父这种上帝观是有道理的。”^[19]在新世纪之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提出两项主张：“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睦共处的环境”。^[20]2000年9月，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了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千年和平大会，发表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见解，展示了中国

宗教的良好形象，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基督宗教各界人士应当弘扬全球伦理精神，可以利用各种场合，采用各种形式参与环境治理、植树造林、防治污染，呼吁停止战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支持中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世界和平做出的努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基督宗教是提倡爱、和平与正义的宗教。

致于教会内部，强化管理，纯洁组织，民主办教，培养人才等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工作。此不赘言。

21世纪将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纪。在中国，希望与困难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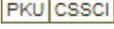
中国基督宗教只要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办教会的方向，坚持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其教义、组织和活动方式等，就能够获得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够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广大基督教徒应当并且能够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作世上的“光”和“盐”。具有中国特色的、团结进步的中国基督宗教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 [1] 新约·哥林多前书 [M]: 第9章22节.
-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M]. 董云虎. 人权——中美较量备忘录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3] [6] 徐如雷. “三自”的“三性”、成就、意义和前途 [J]. 宗教 (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0, (3).
- [4] 全平安. 中国基督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J]. 宗教 (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0, (3).
- [5] 新华社南昌8月13日电.
- [7] [17] 胡绍皆, 王志宏. 背负起天主赐予的十字架 [J]. 中国宗教, 2000, (1).
- [8] 周恩来. 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 [M].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81.
- [9] [10] 王晓朝.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289, 292.
- [11] 卓新平. 中国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社会 [M]. 宗教比较与对话: 第一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2] 吴梓明. 中华文化与基督教. 方克立. 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 上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586.
- [13] 胡乔木. 引导宗教界办社会公益事业 [A].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Z].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105-106.
- [14] 人民日报, 1998-01-24 (1).
- [15] 曹圣洁. 中国基督宗教界探讨“自传” [J]. 中国宗教, 1998, (3).
- [16] 丁光训. 宇宙的基督 [M]. 丁光训文集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93.
- [18] [德] 孔汉思, 库舍尔.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导言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4-6.
- [19] [20] 王作安, 卓新平. 宗教: 关切世界和平 [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8, 181.

(责任编辑: 子方)

中国基督宗教如何面向新世纪

作者: [陈建明](#)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刊名: [社会科学研究](#) 
英文刊名: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年, 卷(期): 2001, ""(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6条)

1. [新约·哥林多前书](#)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1998
3. [徐如雷 三自的三性、成就、意义和前途](#) 2000(03)
4. [全平安 中国基督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0(03)
5. [新华社南昌8月13日电](#)
6. [胡绍皆, 王志宏 背负起天主赐予的十字架](#) 2000(01)
7. [周恩来 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 1984
8. [王晓朝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1997
9. [卓新平 中国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社会](#) 2000
10. [吴梓明 中华文化与基督教. 方克立](#) 2000
11. [胡乔木 引导宗教界办社会公益事业](#) 1995
12. [查看详情](#) 1998
13. [曹圣洁 中国基督教界探讨自传](#) 1998(03)
14. [丁光训 宇宙的基督](#) 1998
15. [孔汉思, 库舍尔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导言](#) 1997
16. [王作安, 卓新平 宗教: 关切世界和平](#) 2000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陈才俊, Chen Caijun 跨文化对话: 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现代化解读——以章开沅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为例 - 世界宗教研究2007, ""\(1\)](#)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 开始涉足一个对其而言全新的学术领地——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章氏将中国基督宗教史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观视域, 以现代化理念解读宗教传播的神学内核与价值取向, 理性还原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根植的艰难进程。本文对章开沅先生于中国教会大学史、中外基督徒教育家、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等方面研究的学术思想, 予以粗浅探析。
2. 期刊论文 [陈才俊, CHEN Cai-jun 挑战、适应与融合: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章开沅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46\(2\)](#)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挑战、适应与融合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 开始涉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 不仅个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而且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章氏将中国基督宗教史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观视域, 以现代化理念解读宗教传播的神学内核与价值取向, 理性还原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根植的艰难进程。
3. 会议论文 [曾铁 基督宗教建筑是建筑史与文明史的要素与范本](#) 2009
基督宗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及建筑是建筑史、文化史、文明史的要素、符号与重要代表, 它是建筑、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发展、完善的动力, 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源泉。
4. 期刊论文 [傅敬民, FU Jing-min 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进程中的权威建构与《圣经》汉译 -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3\(4\)](#)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离不开基督宗教权威在汉语世界中的建构。而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实际上意味着来自异域的《圣经》符号资本如何与汉语进行“象征性运作”, 也就是说基督宗教权威的确立是与《圣经》汉译紧密相联的。《圣经》汉译历经千余年, 已然在中国文化变迁中构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 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作用于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
5. 期刊论文 [赵红 中国需要道德的复兴——试析傅兰雅的基督宗教伦理观 - 世界华商经济年鉴·高校教育研究](#)

傅兰雅肯定基督教在道德伦理功能上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基督教可以教化人,其基督教的伦理观直接来源于其基督教的信仰与自己在中目的践行,该观点与其在中国的践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伦理观的直接性、全球性、整体性的历史意义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梳理其宗教信仰与宗教伦理观有益于加深对他的宗教思想的了解与认识,这也是研究傅兰雅不可或缺的一方面。

6. 学位论文 赵峥嵘 基督教大学对中印高等教育影响之比较 2006

基督教自17.世纪进入印度和中国后,都在这两个国家扎根发芽,同时教会都把教育作为在这两个国家宣传福音、扩大基督教影响的重要手段。

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西方教会在印度和中国都把开设基督教大学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基督教大学在两国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萌芽期,这段期间也是印度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开始萌芽乃至成型的时期。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起步早、数量多、为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起了指路的作用,因此自己也从一开始就被纳入高等教育的体系之中。印度的基督教大学从一开始就面向各个种姓,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目的更注重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而早期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无论在规模、程度、学生数量上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影响较小,且处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外。在目的上也更注重培养本国的神职人员,所以被传统社会所排斥。第二个阶段是成型期。在这一时期,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发展,教会学校的框架渐渐成型。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也已经成型。印度的基督教学院在数量以及占整个国家大学的比例都不如萌芽期,仍然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却抓住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机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数量、质量和内在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发展期,这个时期两国的基督教大学除了数量增加外,原有的基督教大学在规模、质量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基督教大学中有许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印度的基督教学院中,天主教会所办的学院十分引人注目,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仍然以美国的影响为主。第四个时期是成熟和转型期。在这个时期,两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最终成熟并定型,但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命运。印度的基督教学院继续成长,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体制中的比例越来越下降。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则因为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而被并入其他院校中。印度由于国内自主教会的增加和办学热潮的兴起,基督教学院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经历调整后数量大大减少,与印度已经无法相比。

基督教对印度社会的意义是:印度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主机构的建立、印度教的改革,都曾受到基督教的一定影响。在中国,基督教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进作用,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督教对两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之比较,共性是:都对本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都重视女子高等教育,都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但是,两国受到的影响是不完全一致的,表现在: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中国,在规模上也超过中国。印度的基督教大学从办学之处就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注重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因此对印度的教育乃至社会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一开始的目的是培养教人才,独立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直到面临世俗化的冲击和中国政府要收回教育权才不得不改变自身。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两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各自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并受到了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反作用力和冲击。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两国的基督教大学还将进一步对自身进行调整,以期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做出更大的贡献。

7. 期刊论文 荆世杰, Jing Shijie 中国基督教研究:范式的转移与跨学科整合 -江海学刊2007, ""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基督教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研究范式的递嬗、地域研究的兴起、跨学科整合的趋势可谓三大突出特征。而这三大特征的形成与海外中国基督教研究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借鉴海外基督教研究的模式与成果,或能对国内的研究有所裨益。

8. 期刊论文 樊志辉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互动之探析 -学习与探索2002, "" (3)

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是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传教方式、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反应、非基督运动与本土化运动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冲突,源于不同思想理念的混淆,没有分清基督教的超越信仰的价值维度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维度。

9. 期刊论文 卓新平, Zhuo Xinping 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看基督教与儒家精神 -世界宗教文化2010, "" (1)

本文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来探究基督教与儒家精神的意义及作用,对之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和谐”这一核心理念,文章一方面将对作为中国“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共在及相互交往之基础的儒家精神修养及其“仁爱”观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精神超越及其信仰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彩虹”之约所展示的“和谐”蕴涵加以阐述。本文认为,“和谐”观念作为中国基本社会交往的理论、及其所指导的历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宗教境界及情趣,因此,不应该将儒家精神与宗教精神截然分开;并进而指出,儒家“仁”、“礼”观念体系中共有“宗教性”的因素,其“仁爱”之说亦与基督教“上帝是爱”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二者可以比较、对话。本文为此阐述了儒家精神修养与基督教精神超越的不同,从界说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来解析其“内在超越”的追求及意义,由此说明了其“现实关照”与“终极关切”的不同意趣,并对“现实性”向“终极性”的升华、以及“圣爱”与“人爱”之互动、“超然”与“内在”之呼应当代儒家精神复兴与革新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世界”的确需要“从心开始”;而要真正实现“世界和谐”,则也应朝向人性修养所想达到的“超越自我”之升华境界。

10. 学位论文 王春媛 哈尔滨市基督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发展研究 2009

本文对哈尔滨市基督教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哈尔滨自1905年建市以来,宗教就与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关系。俄国为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而修建中东铁路,为当时的哈尔滨带来了各种风格迥异的教堂建筑共计70多座,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造型别致、优美。当时大批西方淘金者涌入哈尔滨,在哈尔滨投资成立了各种工厂、商贸公司、银行、商铺等,在哈尔滨这个开放的边疆城市,外国人逐渐增多,历史上的哈尔滨最多时曾设有2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这一切都对哈尔滨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哈尔滨也对世界宗教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哈尔滨以其迅猛的发展趋势令人瞩目。而哈尔滨特有的人文历史和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着中外游客,哈尔滨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经贸之城。哈尔滨拥有着特殊的宗教历史,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些外来宗教以及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儒教都曾经在这里扎根繁衍,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些宗教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些独具宗教色彩的建筑,更多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宗教文化,哈尔滨之所以特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最为开放的城市,很多国家的艺术大师将自己的艺术作品留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音乐、壁画、文学作品,体现了他们独具特色的宗教情怀,它们对哈尔滨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kxyj20010401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2e15e620-f377-47e9-b395-9e4d0073a578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